

升卦的六四爻辞是：“王用亨于岐山。吉，无咎。”说的是亶父到达岐山下的周原，拜见了武乙王，武乙举行祭祀，同时招待了这位异族番邦的小头领。

周人的史诗《诗经·绵》，记载的就是亶父带领周族迁居到周原的大事件。

绵绵瓜瓞，民之初生，自土沮漆。古公亶父，陶复陶穴，未有家室。

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。率西水浒，至于岐下。爰及姜女，聿来胥宇。

周原膴膴，堇荼如飴。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。日止日时，筑室于兹。

开头部分，是亶父和夫人对周原的首次考察。他的夫人是“姜女”，也就是在豳地娶的姜姓（羌人）女子。豳地周边是姜姓戎人，这种姬姜联姻很正常。后世周人尊称亶父夫人为“大姜（太姜）”，她生了泰伯、仲雍和季历。

亶父夫妇可能是骑着马跟随“中行”的战车出发的，所谓“古公亶父，来朝走马”。去拜见王才是“朝”二史诗中虽略去了商王武乙，但用词仍留有痕迹。他们出山地之后，沿着一片水泊向西走，就到了岐山之下的周原。

益卦的六二爻和六三爻也是记录这次朝见的。六二爻曰：“或益之十朋之龟，弗克违，永贞吉。王用亨于帝，吉。”说

的是有人赠给（亶父）一只占卜用的龟甲，价值二十串海贝，用它占卜得到的结果会很吉利，不可违抗；（武乙）王还在这里祭祀了上帝，很吉利。羌、周等西部族群本来没有用龟甲占卜的习惯，他们只会用牛马的肩胛骨，碾子坡虽出土了很多这类卜骨，但从没有龟甲。龟甲占卜是商人带来的习惯。

六三爻记载的是亶父朝见武丁王的细节：“中行告公用圭。”意思是，那位招募他来的“中行”教他如何用玉圭朝拜王。这条爻辞还说，用益卦来占卜战争，没有灾祸，会捕获俘虏。⁶

到了周原后，亶父认真地观察环境，发现这里有广阔而平坦的草场和树林，很容易开垦成大片农田，长出的苦菜也像麦芽糖那样甜，正所谓“周原康臝，苙荼如飴”。总之，周原比豳地-碾子坡局促的沟谷好得多，占有和开发这里，周族人口会增殖很多倍。于是，亶父开始考虑迁徙大业。他在龟甲上凿了小坑进行占卜（爰契我龟），结果是，就在这里留下，现在正是好时机，应当在这里修建房屋，正所谓：“曰止曰时，筑室于兹。”

其实，亶父和姬周族在这之前对周原也会有所了解，毕竟碾子坡到这里不算太远。但之前这里不安全，不仅有满怀敌意的野蛮部落在此活动，强大的商朝-崇国军队也时而前来屠戮破坏。如今有了商王的首肯，这就完全不同了。

趣慰迺止，范左筮右，迺疆筮理，迺宣整亩。自西徂东，周爰执事。

乃召司空，乃召司徒，俾立室家。其绳则直，缩版以载，
作

庙翼翼。

掾之澳澳，度之薨薨，筑之登登，削屡冯冯。百堵皆兴，
< 鼓弗胜。

迺立皋门，皋门有伉。适立应门，应门将将。迺立冢土，
戎 丑攸行。

肆不殄厥愠，亦不隕厥问。柞栽拔矣，行道兑矣。混夷脱
矣， 维其喙矣！

虞芮质厥成，文王蹶厥生。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后。予
曰 有奔奏，予曰有御侮！

最后，《诗经·绵》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记录周原的建设工
作。 亶父一路安慰追随他的民众，最后在周原停下来。他先在
原野上 规划，确定各宗族占有的疆界以及村舍和田亩的方位，
然后是各 种分工和任命，如司土（司徒）和司工（司空），让
他们带领民众 建设家宅。最先建好的是周族的宗庙，供奉自姜
嫄、后稷以下的 历代族长。

和《生民》歌唱后稷的农耕事业以及《公刘》颂扬公刘迁
居豳 地一样，《绵》也洋溢着欢快、昂扬的情绪。这些史诗都
喜欢用排比， 罗列先民的种种劳作场景。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
版筑夯土墙，先拉绳 子画出笔直的墙基，再埋柱子，固定两面

木版，中间填土夯筑牢固，然后固定更高一层木版，继续向上夯筑。

夯土版筑需要密集的协作劳动，周人便唱起节奏明快的歌谣来协调动作。周人史诗的四字句，很可能就源自集体劳作时的“夯歌”。当上百堵土墙同时动工，轰隆隆的夯筑声比鳄鱼皮鼓还响亮：“揉之膜膜，度之薨薨。筑之登登，削屡冯冯。百堵皆兴，暮鼓弗胜。”

周人还建起“皋门”和“应门”，说明中心聚落有两层土墙和环壕防御。周原考古还没有发现先周夯土城墙，甚至连亶父时期的建筑遗存也没有。可能在立足之初，周人的工程建设规模还很有限，能留下的遗迹更是微乎其微。但亶父时期的周族，像是一颗种子，体量虽小，但只要落在合适的土壤里，就有长大的可能。

《诗经》还记载说，周族初到周原时，这里的原野上长满了树林和灌木，并且有和周人敌对的土著部族“混夷”和“串夷”。⁷所以，周人在砍伐树林上投入了很多劳作，他们挖掘土壤里的树根，平整土地，开垦农田，而当树林消失，串夷部落就逃窜走了。

作之屏之，其蓄其翳。修之平之，其灌其树。启之辟之，其程其榘。攘之剔之，其糜其柘。帝迁明德，串夷载路。天立厥配，受命既固。（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）

在后世周人的史诗里，亶父被尊为“大王”（太王，古老的王），他迁居岐山之阳的周原，也被描述成周人“翦商”事业的开端：

后稷之孙，实维大王。居岐之阳，实始翦商。（《诗经·鲁颂·宫》）

但在亶父的时代，周族还完全没有挑战商朝的可能性，也不可能 有称王的非分之想，这应该都是周朝建立之后对历史的改造。不过，这首史诗措辞颇有些狡猾，它说亶父“事实上开始了翦商大业”（实 始翦商），其实正是为了遮掩当时还没有这种现实可行性。

迁居周原之后，周族并非一切顺利，尤其族长家还发生了分裂。

出走的兄长，远来的妻子

史书记载，亶父至少有三个儿子：泰伯、仲雍和季历。亶父想把 族长之位传给幼子季历，于是两位长兄高风亮节，离开周族去了南方 蛮族之中生活，后来，他们的后裔建立了吴国。

太伯、仲雍二人乃奔荆蛮，文身断发，示不可用，以避季历。

（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）

这段记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，因为关中的周原和江南的吴相隔太遥远了。有些史家认为，泰伯和仲雍逃往的应该是山西南部的虞国，也有人说是关中西端的宝鸡一带。⁸

两位兄长的行踪难有定论，但兄弟三人决裂的原因，很可能比史书记载的要复杂。

武乙王恩准姬周族迁居到周原是有条件的，立足安居之后，周族人需要承担相应的义务，这便是替商朝捕猎人牲，以供商王献祭。

甲骨文中用于献祭的羌人，是周人的同宗、近邻和联姻盟友。因此，为商朝捕猎羌人（周人文献里的姜姓戎人）并不符合周人的传统伦理。这可能是泰伯、仲雍与父亲决裂的根源，他们希望躲开这件可怕的事。

而幼弟季历则和父亲站在一起。毕竟，只有依附强大的商朝，周族才有发展的机会。或者说，通过亶父的朝见，周族上层在见识了商朝发达的战争和统治技术后受到巨大震撼，他们已无法满足那种蛮荒深山中的生活。

后来，季历继承了父亲的族长之位。对季历来说，在作为继承人和族长的时期，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征伐各种戎人，给商朝缴纳俘虏。传世的史书虽没有记载这些，但4世纪初（西晋）的《竹书纪年》里记载了一些季历的事迹。⁹

据《竹书纪年》，武乙王三十四年，季历到殷都朝见，被王赐予土地三十里，玉器十套，马八匹。这三十里土地很可能

在商都近郊，以作为季历在殷都生活的封邑。看来季历获得了武乙王的赏识。

为了持续获得商朝支持，周族必须为商王征战，缴纳“血税”。季历在主持周族的十几年里，几乎一直带着部属在外面征讨，这也使周族变成了一个高度武装化且热衷于战争与劫掠的部族。

武乙王三十五年，这位好战且慢神的王再次亲征关中，周族则为商王充当马前卒，大力征讨周边部族。据《竹书纪年》，在这一年，季历的征伐获得重大战果，他率军进攻“西落鬼戎”，可能是山西和陕西两省之间的土著部落，战果是俘获了二十位“翟（狄）王”。

文王的未济卦九四爻涉及了这一事件：

贞吉，悔亡。震，用伐鬼方，三年有赏于大国。

这句爻辞的大意是说，季历的征战虽然艰难，但战果颇丰，周族也因此更得到商王朝（大国）的赏识，似乎前途一片光明。但武乙王却在此次巡视和亲征中离奇地死亡，据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武乙猎于河渭之间，暴雷，武乙震死。”“震死”，就是被雷电劈死。未济卦九四爻辞中的“震”似乎也与此有关。

武乙王暴死之后，其子文丁（第二十八王）继位。¹⁰

文丁二年，季历再次带领族人远征，“伐燕京之戎”，结果遭遇惨败。“燕京”，古代注家解释为山西太原一带。对于周族来说，这是一次跨越黄河、进入汾河上游的远征，所以周人不可能占领如此遥远的土地，战争目的应当还是捕猎当地土著向商朝上贡。

文丁四年，周人又进攻“余无之戎”，获胜，商朝授予季历“牧师”头衔。周人史诗虽一直强调自己是农耕文明，但在商朝看来，它的特点还是畜牧业比较发达。

此后，季历接连取得战果：七年，伐“始呼之戎”，获胜；十一年，伐“翳徒之戎”，俘获三名酋长。

季历还从挚国迎娶了妻子。挚是个东方小国，族姓为“任”，这位妻子被后世周人称为“大任（太任）”，她是当时挚国国君的二女儿（挚仲氏任）。后世注家解释，挚国在今河南省汝南一带，属于殷商的南土，一个附属于殷商的土著小邦，知名度很低，记载非常稀少。不过在亶父和季历时代，这大概是周族能攀附的离商朝最近的婚事。¹¹

在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中，周人向西土各部族宣称，这位新夫人是从殷商王朝嫁过来的，暗示她是来自商王家族的公主：

挚仲氏任，自彼殷商，来嫁于周，日嫔于京。乃及王季，维德之行。大任有身，生此文王。

但周人这个说法有很多漏洞。商王家族的族姓，是“子”；而摎国的族姓，却是“任”。这说明摎国和商王没有同宗关系。从甲骨卜辞来看，商王家族基本实行族内婚，极少和蛮族藩属通婚。

自从迁居周原，亶父和季历先后带领周族四处扩张和捕捉俘虏，自然和周边族群的关系很差。为此，他们急需用商朝的旗号壮大自己的声势，以震慑周边各族。如此，从东方娶来的夫人自然要派上用场。西土各族群对商朝内部情况很不了解，周人的吹嘘也许能起到一定作用。

从另一面说，迎娶摎国的公主，是周族头领有心向化的表现。在商人看来，刚从豳地-碾子坡迁出来的周族，近乎生番；而摎国，则更接近中原文化圈，国君家族应当比较商化，可能会使用商人的文字和官方语音，如此，新娘大任给季历和周族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，特别是她生了一个叫周昌的儿子，也就是后来的文王。

母亲对儿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。周昌成长的环境，肯定兼有商和周两种文化氛围，尤其是自幼就可以说商朝语言，书写商人的文字，甚至晚年还沉迷于占卜和易卦占算，这应该都和母亲带来的文化影响有关。

但季历时代的周族尚未脱离野蛮色彩，因此，从相对繁华开化的中原远嫁荒僻西土，这让大任一直难以适应。后世经过改造的历史说，大任在怀胎（周昌）之后，“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（傲）言”，全面符合儒家的妇道礼仪，

是胎教的创始人。其实，这很可能是和丈夫疏远而造成的家庭生活冷淡所致。据说，大任是到猪圈里小便时生下文王的。可见，此时周族首领家的生活条件与部落普通民众并没有太大差别，从东方邦君家族嫁来的女子自然难以适应。¹²

周昌还有两个弟弟，后世的称号分别是虢仲和虢叔，但这两人知名度极低，可能是季历与其他女子所生。

文丁王在位时间不长，可能只有十一年。在他驾崩前不久，季历到殷都献俘，却诡异地被杀死。《竹书纪年》的记载是：“文丁杀季历。”此外，没有更多信息。事实上，文丁王和季历可能都是死于商朝内斗。下一位商王是文丁的儿子帝乙（第二十九王），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商朝传统的祭祀方式，改用了一套被现代研究者称为“周祭”的制度。

当然，这个周祭和姬周族毫无关系。它的特点是不再祭祀上帝及山岳河川、龙、凤、四方等自然神，只祭祀历代先王；而且，统一规定给各位先王献祭的时间和方式，形成一张一年周期的巨大值日表，不必再临时占卜决定。而这限制了占卜师和祭司的权力。

“周祭”是商代第二十四王祖甲最先发明的，被董作宾先生称为商人的“新派”宗教。但祖甲死后，旧宗教迅速回潮，直到末代二王帝乙和帝辛（纣王）时期，新派的“周祭”才算正式确立下来。新派宗教甚至不仅称先王为“帝”，也称在世之王为帝，所以商朝末代两王的称号分别是帝乙和帝辛（纣

王)。按照商人的传统宗教，这肯定触犯了天界上帝的独尊地位，几乎是大逆不道的僭越。

商朝上层的这场宗教改革可能伴随着宫廷内的派系斗争和政变。文丁王的死因难以确定，但季历属于老王亲信，自然是新王帝乙的对立面，所以他很可能是与文丁王的势力一起被消灭的。帝乙初年重启革新，新旧两派争的就不仅是仪式，也是权力分配。老派宗教祭祀的各种自然神，可以包含一些非商族起源的神灵，这为商王拉拢异族提供了操作空间。新派却是一个更加保守的王族小群体，排斥一切没有商王族血统之人，因而季历这种当红的蛮族酋长自然下场堪忧。

季历死时，周昌可能还不到十岁，应当会有老练的家族成员“辅政”。《竹书纪年》记载，帝乙二年，“周人伐商”。这显然是不自量力之举，所以，现实地看，也许是周人不得已介入了商朝内战。

周族的直接领导是老牛坡的崇国，而武乙王也数次亲征关中，应该和崇国关系非常密切。也许在文丁王死后，崇国曾纠集周之类的番邦介入朝廷内战，但帝乙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，这次勤旧王之举也就只能是半途而废。

帝乙似乎没有报复西土的这些侯和伯的举动。他和父亲不一样，对西部的扩张事业可能并不感兴趣，只要羌人俘虏能一直按期送到殷都献祭给列祖列宗就行了。而且，像周这种蛮族的首领也很可能不再有获得重用的机会，并被禁止进入殷都，毕竟崇国这种西土侯国足以管理他们。所以，在甲骨卜辞里，

帝乙上位之后的三四十年中，周族 上层再没有获得商王赏识的记录。

幼年的周昌只能安于他的西土生活。这个小邦又经历了四十余年 沉寂的时光，直到因为周昌晚年发生的某些事变，才再次进入庞大商 朝 的视野。彼时，商王已经换成了帝乙的儿子帝辛，也就是后世著名 的商纣王。

注释

1 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帝武乙无道，为偶人，谓之天神。与之博，令人为行。天神不胜，乃修辱之。为革囊，盛血，昂而射之，命曰‘射天’

2 白川静注意到了周人崇拜天的现象，他认为武乙侮辱天神是为了 “侮辱周人 之信仰”。但本书认为，在武乙时代姬周族还非常弱小，商朝人恐怕不会注 意到它有什么信仰，更不至于蓄意侮辱其信仰，史书也没有记载武乙辱神之 事发生在关中。如武乙想侮辱周族，用后稷做靶子似乎更合适。武乙之事从 发生到记录成文，中间经历了较长的流变，从西周开始，宗教观念里的帝与 天已经混淆不分，所以才会把武乙羞辱的上帝记录成天神。〔日〕白川静：《西 周史略》，袁林译，三秦出版社，1992年，第15页。

- 3 见《孔丛子·居卫第七》。该书是西汉初年作品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可能 部分取材于此。

- 4 高亨认为，“依”通“殷”，此爻内容可能涉及为殷商而搬迁，“武乙与古公 亶父年代亦相值，则《易》所记盖武乙亶父故事，所谓公即古公亶父欤？” 见高亨《周易古经今注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281页。
- 5 这里的“古公亶父”，曾被认为是亶父的全称。也有学者认为，“古”是表示 追溯的“当年”之意，“公亶父”是称呼，其中“公”又表示长者尊称，“亶父” 是日常用的称呼。
- 6 益卦之“用凶事，无咎，有孚”。
- 7 也许他们本是同一个部族，只是后来的古文字用了两种写法而已。
- 8 尹盛平：《西周史征》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61页。
- 9 西晋时期，有人盗掘战国魏王墓，挖出了很多竹简，当时的学者释读和整理 了这些竹简，定名为《竹书纪年》，但在印刷术普及之前，此书失传，只有 被唐宋著作引用过的一些句子保留了下来。

10 《史记》等传世史书写作“太丁”，“文丁”是甲骨卜辞的写法。

11 但在春秋时期，黄帝的传说被制造出来之后，任姓和姬姓都被列为黄帝之子。 这可能是后世周人在抬高自己母系先祖

的地位。见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：“凡黄帝之子，二十五宗，其得姓者十四人，为十二姓：姬、酉、祁、己、滕、箴、任、荀、僖、姑、假、依是也。”

12刘向《列女传》卷一：“大任者，文王之母，挚任氏中女也。王季娶为妃。大任之性，端一诚庄，惟德之行。及其有娠，目不视恶色，耳不听淫声，口不出敖言，能以胎教。法于豕牢，而生文王。文王生而明圣，大任教之，以

一而识百，卒为周宗。君子谓大任为能胎教。”

13来自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的《夏商周年表》。参见胡厚宣、胡振宇《殷商史》，第630页。

14董作宾：《殷历谱》，（台北）“中研院”影印本，1964年。

第十七章周文王地窖里的秘密

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的家宅，极少有机会被发掘到，或者即使发掘到了，也缺乏相应的记载。比如，殷墟发掘了很多宫殿基址，但我们无法确定商王们到底居住在哪座建筑。即便是秦皇汉武、唐宗宋祖，我们也无法指认他们住在遗址建筑的哪间殿堂。

只有周文王是特例。1976年，他居住的宅院被完整地发掘了出来，而且有甲骨卜辞为证。这座宅院不仅展示了周族首领的生活空间，还隐藏着文王的惊天秘密：和诸神共谋的翦商事业。

让我们从青年时代的文王开始。

文王是纣王的姑父？

渭河上喧嚣了起来，很多条小木船被系在河中，上面铺有木板，一座浮桥就这样搭了起来。青年族长周昌，后来的周文王，带领着族人在渭河边迎接从东方远道而来的新娘，隆重地宣扬这场婚姻带来的荣耀。新娘来自姒姓的莘国，后人称为“大姒”。

《诗经·大明》曰：“文王初载，天作之合。”这是上帝（天）亲自撮合的婚事，而这位来自大国的女子简直就是天帝的妹妹：“大邦有子，何天之妹。”文王晚年创作的《易

经》有两个卦的爻辞出现了“帝乙归妹”，意思是时任商王帝乙（纣王之父）下嫁了妹妹：“帝乙归妹，以祉元吉。”按照这种说法，文王成了帝乙的妹夫，纣王的姑父。

不过，这显然不是事实，因为姒姓并非商朝王族，更不可能是商王帝乙的妹妹，估计周人自己也不会当真。那么，大姒的莘国在何处？有旧说是今陕西省合阳县，但未必成立，因为合阳县和周原都在渭河北岸，往返不需要渡过渭河。莘国应当和挚国类似，也在河南地区，新娘的车队从豫西古道驶向关中，然后向北渡过渭河，才抵达周原。I

莘国姒姓，据说是夏王室后裔。这个小国似乎以女子著称。商代开国君王商汤的夫人出自莘国，再后来，周昌被商纣王囚禁，臣僚们为营救主公，搜罗各种名贵礼物进献商纣，其中就“有莘氏美女”。也许正是文王的夫人出自莘国，才引发了后来各种附会的历史创作。

和文王母亲的挚国相比，莘国的知名度更高一点。这也是周族势力上升的体现，它已经是西土一个颇有前途的新兴小邦国。莘国嫁来的有姐妹两个，所谓“缴女维莘“缓”，连续、不止一个之意。周昌还暗中怀疑，好像姐姐的衣服不如妹妹高级：“帝乙归妹。其君之袂，不如其娣之袂良。”（《易经》归妹卦六五）妹妹可能嫁给了周族另一个重要人物召公奭。召公奭的年龄比周昌小，在周昌晚年以及武王的灭商事业中，作用非常重要，他的头衔是“太保”，意为“国君的监护人”。

商周时代，职位多是世袭。召公爽的父亲可能辅佐过少年周昌，才使自己的家族得到了“太保”的殊荣。正如前文所述，周昌童年丧父，过早地登上了族长之位，²应当有长者替他管理周族事务，召氏家族的可能性很大。

召公家族虽也是姬姓，但和周昌家族似乎没有太近的亲缘，至少史书中没有这方面的记载。³武乙王时期的卜辞经常出现讨伐“刀方”的记载，陈梦家认为刀即是“召”，⁴本书推测，“刀方”可能是召公所属的召部族，他们因遭受来自商人的沉重打击，侥幸残存的成员（如召公爽的祖父辈）后来投靠了周族。这位没能进入史书的召公爽之父，这里可以暂时称其为“召祖”。

召氏有和商人长期作战的经验，召祖也比较熟悉商朝的情况，并辅佐少年周昌直到成年。周昌的婚事很可能也是召祖奔走操办的，还顺便给自己的儿子、后来的召公爽娶了一位莘国公主。周昌因此又和召公责成了连襟。

《易经》归妹卦显示，妹妹的嫁妆似乎更丰厚。也许是因为她在娘家更受宠爱，也许是因为召祖在周族“辅政”多年，女方家族更重视这位实权人物。来自东方的新娘也造成了召公爽家族的某种商化，比如，他或者他的孩子就有名“辛”的，而用生日的天干作为名字是商人的习俗。⁵

结婚后的周昌很快便开始“亲政”，新一代周族人的历史就此开启。

和父亲季历相比，周昌的夫妻生活要幸福得多。这部分是因为周族上层已逐步商化，族长家也阔绰起来，有了体面的大宅院，族长夫人已不用再把猪圈当厕所。

周昌这一代的首领和东方贵族的交流已经没有大的障碍。他以多子著称，有所谓“文王百子”之说。仅他和大姒生下的儿子就有十个左右，此外，还可能有几个庶出的儿子，但没有任何女儿的信息。

商王帝乙可能在位二十六年，然后由儿子帝辛继任，这便是末代商王纣。他名为“受”，也称“辛受”。“纣”可能是后世周人给他的贬义称呼。

这一次商王更迭时，周昌大概三十岁稍多，而周族人最重要的工作仍是为商朝征战和捕俘。从《易经》的一些内容来看，周昌年轻时经常带领族人远征羌戎部落，积累了很多捕俘经验。不过随着儿子们逐渐长大，周昌开始脱离征战厮杀，由长子伯邑考和次子周发（后来的武王）更多地承担军事工作。

伯邑考后来死于殷都，在史书中，他的信息很少。文王诸子都是单字名，比如，武王叫发，周公叫旦，只有伯邑考的名字比较奇怪。其实，这背后有很多隐情。

他原名应该叫邑。“伯”，表示他是嫡长子，这是周人的家族排行用语（伯仲叔季）；“考二意为父亲，但伯邑考没有后嗣，实是后世周王室祭祀时对他的尊称。从这个不同寻常的称呼也可以看出来，他本应是周昌的继承人。

《诗经·大明》曰：“长子维行，笃生武王。保右命尔，变伐大商。”这里，长子（周邑）的名字被隐去，且暗示死在了外地（维行），二弟周发这才成为周族继承人。伯邑考之死是商周关系的重要转折，让文王的翦商决心从此不可动摇。

文王是何时萌生翦商之意的，已经无法确定，但至少在他有机会 去往商都之前，对商朝的认识肯定非常模糊，应该不会有明确的计划。最早开启文王想象力的，是占卜。

当儿子们能够替自己分担一些工作后，周昌便开始研究占卜、祭祀、通灵等巫术。他这方面的兴趣，最初可能来自占算捕猎羌戎的方法，诸如在何时或何地设伏。甲骨占卜技术的起源很早，从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开始，华北地区就已经流行用牛或羊的肩胛骨占卜吉凶。而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周昌开始进入危险的禁区。

甲骨占卜的表面原理是观察骨头或龟甲上烧烫出的裂纹（兆纹），解读吉凶；但其深层原理却是通灵，即向某些特定的神灵询问神意。比如，商王会向历代先王或上帝提问，然后神的解答会表现在骨头的裂纹上。而比商王地位低的人，无权请教高级神灵，只能求助于低级的鬼神，比如自家先祖或本地土地神，乃至家里的灶神等小神。

而且，普通人不能把占卜内容用文字刻写在甲骨上。殷墟发现的甲骨卜辞，绝大多数都是历代商王的，只在武丁时期有极少数的王子卜辞。这可能是商人的一种宗教观念，认为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可以传达给诸神，是人神沟通的唯一通道，所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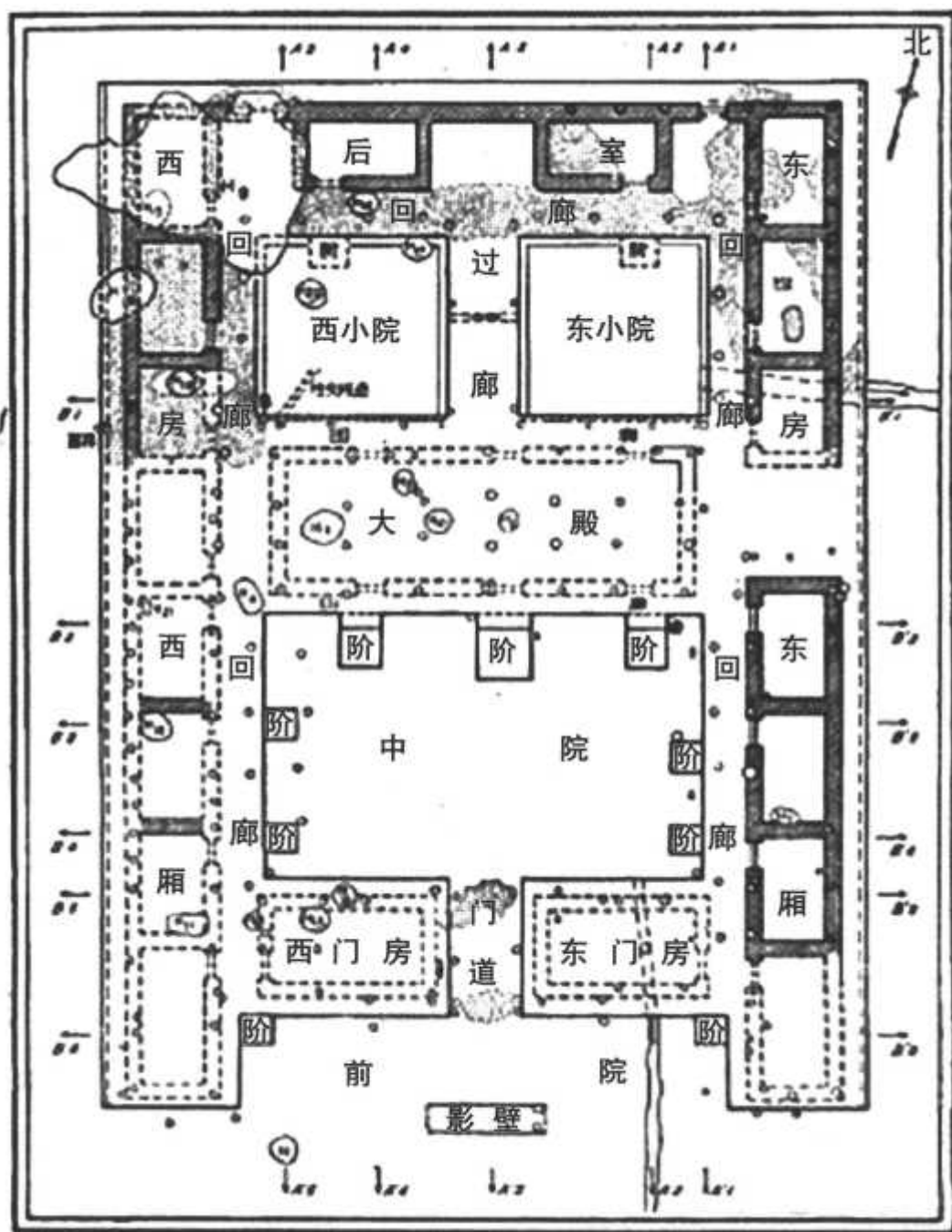
严禁王之外的人采用。商朝分封在外地的重要侯国，如盘龙城和老牛坡，都没有发现刻字的占卜甲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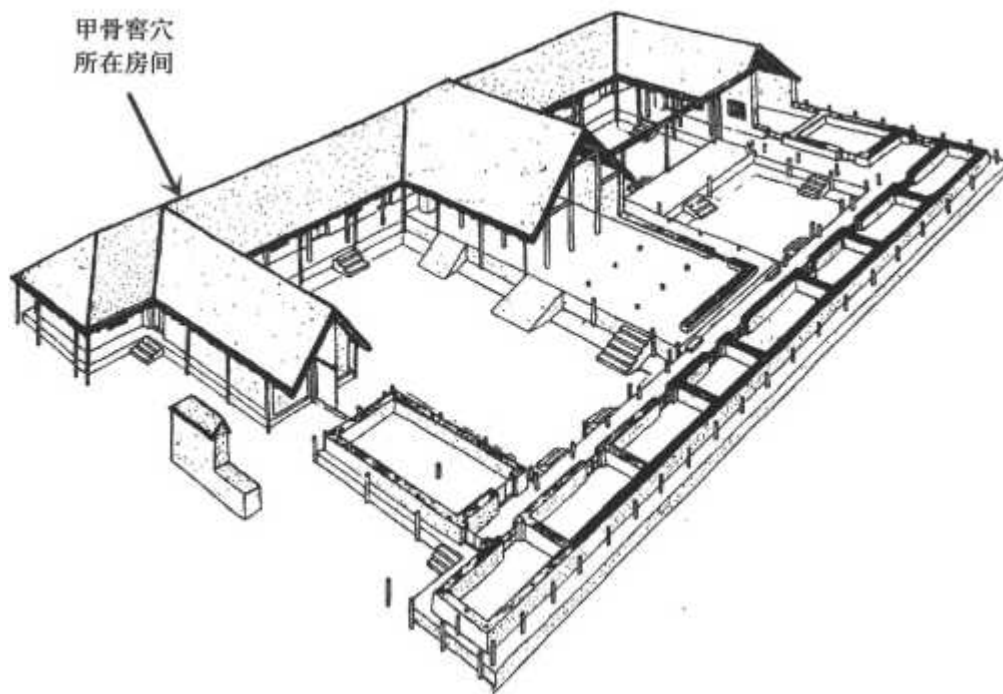
周昌还想尽办法搜罗来自商朝境内的人，以获取和利用商朝上层的占卜通神技术。《史记·周本纪》说，文王礼贤下士，为了接待外来的有才之人，经常到中午还顾不上吃饭，所以从商朝投奔他的人逐渐多了起来，有太颠、閼天、散宜生、鬻子、辛甲大夫等人，甚至远在孤竹（据说是辽西）的伯夷和叔齐兄弟也来到了周原。不过，这些人的身份来历大都不可考，只有辛甲大夫可能是商人——因其名字中有天干，这是商人的起名习俗，但连用两个天干的也很少见。

周族首领的四合院

文王宅院位于岐山脚下的周原，今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北侧，编号为凤雏村甲组建筑基址。院落坐北朝南，东西宽32.5米，南北长45米，总面积1469平方米，相当于三个并列的标准篮球场。有三排房屋、两进庭院和东西厢房，围拢成一个标准的四合院，大门外有一堵影壁。⁷

整个院落为夯土木结构，夯土台基厚约1.3米，墙壁厚0.6—1米，屋顶檩条上铺紧密的芦苇捆束，再抹泥构成屋顶。所有地板、墙面和屋顶都涂抹了1厘米厚的白灰砂浆，室内墙面的白灰比例略高，呈发





凤雏村甲组基址平面图及复原解剖图

白的浅黄色。影壁上不仅涂白灰砂浆，可能还有绘画。

南面第一排是门房，住着负责迎宾和警卫的人员。左右门房之间的门道宽3米，勉强可以通行一辆马车，但考虑到大门外的影壁，应该极少有马车入院。

进了大门是前院（报告称为“中院”），两侧是厢房，院内三座台阶通往正厅大殿。正厅跨度较大，不分间，内部有两排木柱支撑屋顶。这是族长平日议事和接见宾客的场所，周族的很多大事都是在这里谋划的。

正厅朝南的一面可能没有墙，只有木柱，构成一面敞厅，来人稍多时，可以聚集在前院，听族长站在檐下讲话。正厅后

面，一条过廊 分割开东西两个小院，北房（后室）和东西厢房围拢起小院，这是族 长家眷们的起居场所。

院落的東西兩面是兩排廂房，各有八間，進深都是2.6米，寬度 略有區別，使用面積在11—16平方米之間，不算大。兩間廚房都在 東廂房，一間在從南數第三間，面對前院，一間在從北數第二間，面 對東小院，廚房內各有一個寬約1米的灶坑。

几乎所有的房屋都有探出的屋檐，有专门的擎檐柱支撑，檐下用 小石子铺成散水面，防止雨水冲刷地面。

正厅是公务议事的场所，主人家平时起居主要在东西厢房內。除 了正面大门，门房和东西厢房之间也各有一座小门，方便家人低调进 出院落。

前院和东小院内 有下水管道通往院外，以便排出雨水。前院用套 接的六节陶制排水管，穿过东门房地下到院外；东小院则是石砌的下 水道，穿过东厢房的地下。

总体上看，这座宅院四面围拢闭合，且有影壁遮挡外来视线，很 重视私密性，且有两个不起眼的东西小门方便进出，低调、审慎、私密、 便利，堪称后世中国民居的典范。

相比之下，商朝建筑很不一样。殷都时代的商朝，王宫区建筑多 采用分散的单排结构，彼此间很少围拢，呈现出不重视防御和隐私的 自信。普通商人贵族的院落，多是完全围拢起的“回”字形布局，犹 如一座全封闭的碉楼。文王大宅则更接近后世的“四合院”。

文王这座宅院似乎很阔大，但因多数房屋开间都比较小，若亲临实地，还是会让人觉得有些局促。考虑到文王有至少十几个儿子，算上女儿的话应该会有30人左右，再加上不止一位夫人以及家仆，这座宅院很难容纳。这样看来，成年的孩子可能另有住处。

经碳十四测年，凤雏村甲组基址（文王大宅）的建筑时间为公元前1095年（误差范围±90年）。从这个年代值看，它建成于周灭商之前半个世纪，当时的文王刚接近成年，或者说，这座宅院是为他的婚事准备的，而周族灭商的事业也将从这里萌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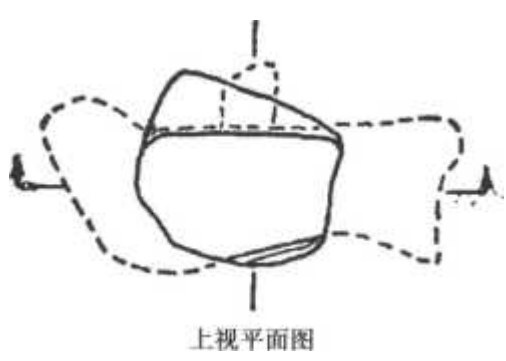
地下工作室

表面上看，文王大宅只是一位西土酋长的体面院落而已，但在不起眼的西厢房，南起第二间，还埋藏着更深的秘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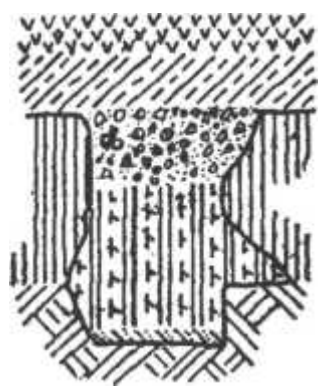
从这间厢房的墙壁下挖出了两座窖穴，较大的H11（1.55米x1米）在屋子东南角，底部逐渐增大，堪称一座微型地窖。向下挖了1.9米，挖穿了1米多厚的夯土台基，然后朝东西两边扩展出一段，形成了一个底部长3米，宽1米，向上逐渐收拢的扁瓶形空间。

对周人而言，这种地下室生活方式不算陌生，在豳地一碾子坡时，他们就主要居住在窑洞或窖穴里。不过，文王在世时，这座微型地窖应该有木制的梯子供人上下，入口可能有木地板或家具提供隐蔽遮挡，是专属于主人的密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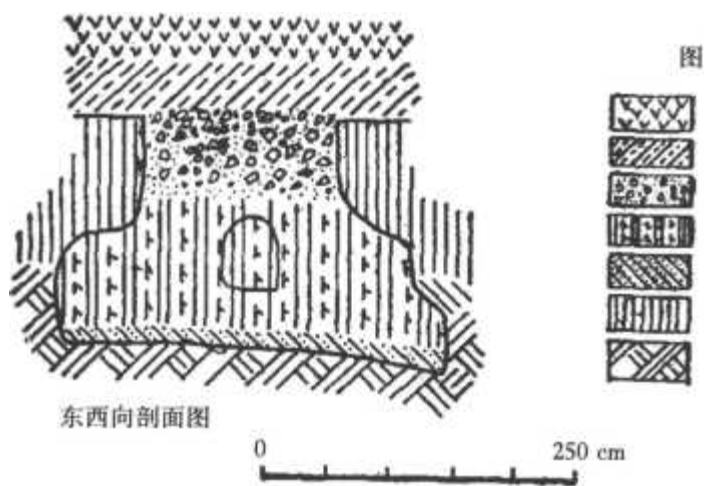
H11地窖中存储的不是普通物资，而是用来占卜的甲骨，一
共发



上视平面图



南北向剖面图



东西向剖面图

图

例

耕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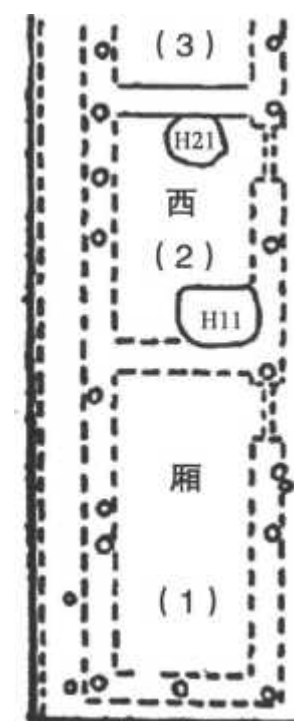
扰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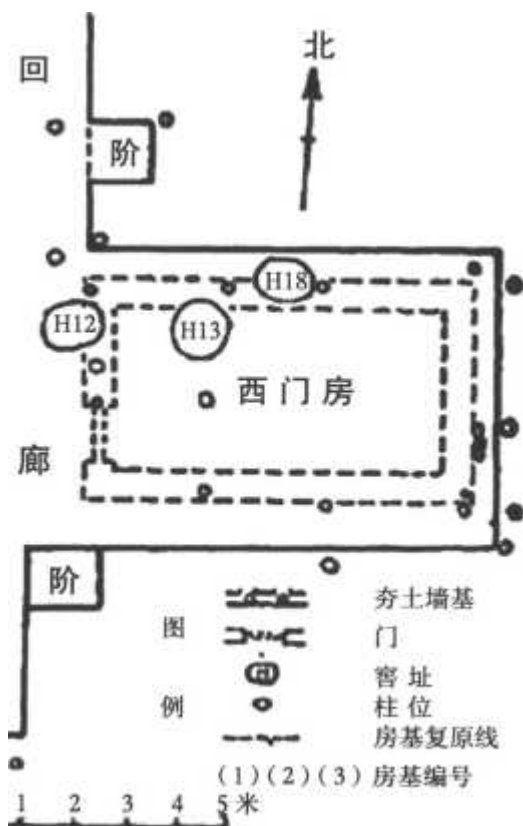
红烧土堆积 卜骨堆积

淤土 夯土

生土

H11窖穴平面与剖面图





H11与H31窖穴的位置

掘出1.7万多片，绝大多数是龟甲，但都是散碎的小块。这些残碎龟甲中，刻字的只有282片。

当然，这座地窖不仅是甲骨储藏室，也是秘密工作室。它的北边土壁上凿出了一个床头柜大小的壁龛，距离地窖底面40厘米，构成一个简易工作台：把油灯放在壁龛里，席地而坐，就可以趴在壁龛里占卜或镌刻甲骨文字。

第二座窖穴H31紧贴北墙，更为隐蔽，初次发掘的时候没能发现。这座窖穴直径约1米，深约1.6米，只是储物而不能容人。里面保存的甲骨很少，有数片刻有卜辞。

考古学者多认为，这座凤雏村甲组基址是周族人的宗庙，依据的是后来《周礼》中“藏龟于庙”的说法。但在周昌时代，周族还没有这种严格的礼制，甚至西周中期的垃圾坑里也还是会发现占卜后的甲骨，所以《周礼》的说法并不符合先周和西周的实际。

而且，宗庙是公共建筑，需要有较大的公共空间，但凤雏村甲组建筑则不同，它的正厅和庭院都不大，而且大门前还有一堵影壁。这都是居家宅院的特征，至少在使用初期，这座建筑就是周昌的家宅。

而比地窖更隐秘和难以解释的，是里面收藏的甲骨。

在殷都，商王都是在整面的牛肩胛骨或龟甲上占卜刻辞，但在文王大宅的两座地窖里，刻字甲骨都是小碎块，刻痕比蚊子腿还细，文字极为细小，小得像粟米粒，必须借助高倍放大镜才能看清楚：多数文字只有1毫米见方，一片拇指盖大小的甲骨就可以刻写20多个字。

在最初发掘时，考古队并未识别出这些刻字甲骨，以为它们只是混杂在泥土中的细碎骨片而已。这种细微的文字难以拓印，所以周原甲骨文都是放大的照片，或者由整理者对着放大镜临摹下来。

为什么要把卜辞刻得如此细微？李学勤先生认为：“甲骨字刻得小如粟米，便是为了把辞局限在相关的兆旁边，不与其他兆相混。”⁹ 意思是说，必须在烫出的裂纹范围内刻字。

不过，从这些甲骨残片看，刻字的空间是充足的，大量残片都是空白，而且，殷墟的甲骨卜辞也都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所以，我们可能还是要从周昌所处的现实环境寻找答案。

实际上，周昌要做的事情，是秘密学习商王的通神占卜之术。而这在商朝过于僭越，而且后来周昌又萌生了翦商造反的念头，就更是大逆不道，超出所有人的想象力。一旦这个阴谋泄露，不仅自己在劫难逃，整个周族也会陪着他一起殉葬。

所以，周昌必须保密。为此，他把自己关在不起眼的西厢房，躲进暗无天日的地窖，做各种占卜推演和刻字，而且故意把文字刻得很细微。毕竟，这是文王最为隐秘的事业。

沉迷占卜算命的人，大都信仰各种超自然能力和现象，包括那些神异的传说。根据商人传说，玄鸟（燕子）是商王的祖先。在《易经》里，有“飞鸟以凶”和“飞鸟遗之音”之类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周昌已经注意到飞鸟会给敌人传递信息，他应该是认为，倘若燕子发现自己的秘密，就会报告给商纣王。而燕子喜欢在屋檐下或屋梁上做巢。所以，为了躲开这些随时飞来的耳目，周昌只能躲进地窖，盖严木板，点起油灯。

文王微雕卜辞的记录

周昌礼贤下士的故事背后，其实是他在努力刺探商朝的信息，而商王家的占卜技术是他关注的重点。传世文献虽不会描写这些内容，但考古可以给我们提供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认知。

周昌需要完成向商朝缴纳人牲的工作，所以他很关心如何捕猎俘虜。西廂房地窖的甲骨刻辞中，有一条（H31:3）是占卜到哪里能俘获人的。这条的释文是“八月辛卯卜曰：其梦启；往西，亡咎，获其五十人？”大意是，八月辛卯日占卜，做梦得到启示，往西方没有灾祸，能捕获五十个人吗？¹¹

五十人是殷墟甲骨中常用的献祭人数。武丁王和武乙王亲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，对如今的商朝而言，人牲主要靠周这种附庸小邦来提供。为此，周昌应该很紧张：为完成商王下达的任务，他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寻找预测手段，就连做梦的启示和甲骨占卜都用上了。

有些甲骨卜辞就更是奇怪，内容竟是祭祀商朝先王，特别是最晚近的文丁和帝乙，也即纣王的祖父和父亲。祭祀的形式也完全是商式的，不仅使用牛、羊、猪，还使用人牲。

甲骨H11:1记载，癸巳日占卜如何祭祀“文武帝乙宗”（纣王父亲帝乙的宗庙），同时占卜是否适合一起祭祀成唐（成汤，商朝开国之王，生日也是乙日），方式则是“报”祭（可能是在大鼎里煮熟）两名女子，还有猪和羊各三头，用血献祭。

甲骨H1L112记载，准备第二天（乙酉日）彝祭“文武丁”（纣王祖父文丁），因为刻字磨损，用的祭品不详，方式是“裂”（肢解）；还有“卯”（对半剖开）。

那么，周文王为何要祭祀商王的先祖？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。

其一，按照当时人的观念，神灵有选择祭品的能力，商王的先祖肯定不会享用周这种蛮夷小邦奉献的祭品。而且，周人也不可能公然给商王的先祖建立神庙，在当时，这属于悖谬和僭越之举，消息一旦传到商朝，会给周人招来杀身之祸。

其二，无论史书还是考古，都没有发现周人有人祭的记录。文王大宅内外从未发现有人奠基和人祭现象，垃圾坑里也没有抛散的人骨，整个周原都是如此。

其三，文王大宅地窖里的卜辞用的都是非常细微的刻痕，和殷墟甲骨很不同，所以这两片甲骨也不会是从殷都（商人）那里带来的。

也许，这是文王有机会去殷都时，偷偷地观察和学习了商人占卜和祭祀的全过程，回到周原后模仿商人的做法刻写的卜辞。

倘若真是如此，那他为何要这样做？今人已经无法找到标准答案，因为占卜预测和祭祀本身就是非理性的产物。而且，周昌对此还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和探索精神，他不仅学习商人的甲骨占卜，还改造了易卦预测技术，创作了《易经》文本。

有些学者认为，文王大宅地窖里的甲骨含有更晚的内容，如周武王时期以及西周初期的成王和康王的卜辞。但这些卜辞数量很少，更缺乏直接证据：对周朝来说，灭商是最为重大的

历史事件，不仅没有 内容相关的卜辞，也没有后世子孙祭祀周文王的卜辞。

要知道，周昌在去世前才把都城搬到了丰京（今西安市西郊）；之后不久，武王就开始建设镐京，灭亡了商朝。也就是说，到这时，周原的文王大宅才变成王室家庙和周文王的纪念馆。结果，到西周末年，整座建筑毁于一场大火（坍塌的土墙和屋顶残块呈现火烧后的破红色），甲骨因保存在地窖里，才侥幸躲过火焚。

保留在文王大宅甲骨上的文字，总量并不太多，且过于零星，但周文王另有一部传世著作《易经》，其包含的周人早期历史更多，只不过，需要新的解读方式，方能还原部分真相。

注释

1 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。另《史记正义》引《括地志》说，“古莘国在汴州陈留县东五里，故莘城是也”。其地在今河南省中部，接近商文化核心区，离夏都二里头也不太远，所以这个说法比陕西合阳说更可取。

2 古史中关于周昌父子年龄的记载多不可靠，比如说周昌活了九十多岁、他十五岁开始生子，等等。这种说法可能来自对《尚书·无逸》的误读，因周公说“文王受命惟中身，厥享国五十年”，后人便错误地理解为文王“受命”担任商族族长后又活了五十年。其实“受命”是指文王决心反商和称王，而

“享国”是指他担任周族族长。“受命”发生在周昌从殷都获释之后，之后数年他就去世了。

3 《史记·燕召公世家》没有记载召公奭的世系，只说他“与周同姓，姓姬氏”。皇甫湜《帝王世纪》说召公是“文王庶子”，即大姒之外的妾所生，但此说不确，因为召公家族又被称为召伯，周人的“伯”必须是嫡长子。

4 陈梦家：《殷虚卜辞综述》，科学出版社，1956年，第287页。

- 5 西周初有“厦侯旨鼎”，铭文有“厦侯旨初见事于宗周，王赏旨贝廿朋，用作妣尊彝”。这位愿侯旨是召公奭的儿子或孙子，被册封为燕（厦）侯，在获得周王的赏赐之后，为祭祀母亲或祖母“妣”铸造了铜鼎——这位“妣”很可能是和大姒一起嫁到周族的姐妹。召公家族其他铜器还提到有一位“父辛”，虽不能确认是谁，但由此可见，召公家族一定程度上已经商化。参见曹斌等《厦侯铜器与燕国早期世系》，《江汉考古》2016年第5期。
- 6 史书和甲骨卜辞中都没有商王在位的具体年数，这是“夏商周断代工程”构拟的时间。参见胡厚宣、胡振宇《殷商史》，第630页。
- 7 陕西周原考古队：《陕西岐山凤雏村西周建筑基址发掘简报》，《文物》1979年第10期。以下凡该基址的基

本信息、数据及图片，未注明出处的，皆出自该书，不再详注。

- 8 平面图改绘自陈全方《周原与周文化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8年。原图绘制较早，当时还没有发现西厢房内的H31窖穴。复原图摘自杨鸿勋《宫殿考古通论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2009年。
- 9 李学勤：《西周甲骨的几点研究》，《文物》1981年第9期。

10陈全方：《周原与周文化》，第110页，图版第64页；徐锡台：《周原甲骨文综述》，三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114页。

11 “西”字，陈全方释为“兹二徐锡台释为“是”，都是指示代词。“获”字，徐锡台认为该字左边是“舟”部，释为“般”；但摹本显示是鸟形的“隹”，应从陈全方释为“获

第十八章 《易经》里的猎俘与献俘

自迁居周原，周族始为商朝的附庸族邦，代价则是捕猎周边山地的羌人献给商朝充当人牲。

商与周的这种关系，从古公亶父晚年开始，历经季历和周昌两代人，甚至可能持续到灭商之前的周武王初年。同期的商朝，则经历武乙、文丁、帝乙（小乙）和帝辛（商纣）四代商王，跨度超过五十年。

在史书和文献里，周人的这段历史被抹去了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和这段历史一起被遗忘的，是商朝的鬼神血祭文化。自周朝建立，人们的记忆里便再也没有了那个血腥、恐怖而漫长的年代，“历史”成为一连串古代圣王哺育和教化群氓的温情往事。

但即便如此，仍有些蛛丝马迹被保留了下来，这便是文王周昌创作的《易经》。周昌一直生活在暗黑的商代，没能等到商朝灭亡便已死去，但他在《易经》里给后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记录，其中就包括商人的血祭仪式和周族充当人牲捕猎者的经验。

周朝建立后，商朝的甲骨档案库被彻底毁灭，但没人敢销毁文王

留下的《易经》，只是，其所记录的残酷事实变成了庸常的内容。这确实奏效，一晃就是三千年。


只有当殷都遗址被考古发掘，出土甲骨文献被释读，真实的商朝往事才渐渐得以复原，《易经》里那些被误读了三千年的词句才能得到重新的诠释，从而，周文王和商纣王的时代开始复活。

作为俘虏的“孚”

文王周昌所作的《易经》，大量地出现“孚”字。它的含义颇为诡异，战国以来，经学家多把它解释成信用的“信”¹，结果造成大量语句难以解释。¹其实，据研究《易经》的高亨先生，这个“孚”乃是俘虏的“俘”之本字。

《说文》：“俘，军所获也。”军队虏获敌方之人员财物谓之孚……古人认为此乃光荣之事，故曰“有孚光”，未济六五云：“君子之光有孚。”句意同此。²

只不过，高亨撰写研究《易经》的相关著作时，商朝杀人献祭的考古成果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，周人曾长期替商朝捕俘的历史也尚未被揭露，所以学界对《易经》中的“孚”还不够重视。

《易经》是商朝末年的产物，释读其中的文字，需要参照商人的甲骨文。甲骨文的“孚”，写作，字形是一只手抓住一个儿童，乃俘获之意，且特指捉来献祭的人牲。

如殷墟甲骨占卜辞：“贞：我用罔孚？”（《合集》903正）翻译为白话是，“占卜：我要不要用猎网捕获俘虏（并献祭）？”这个“罔”是象形字，字形为一人双手举网。这说明商人捕俘用的网具，造型是



《合集》903正：“贞：我用罔孚。”

一张网系在两根长木柄上。此外，甲骨卜辞里还有“用孚”，即杀俘 虜献祭。

用猎网（罔）捕获俘虏之事，在《易经》中也有记载，如晋卦初六爻为：“罔孚，裕，无咎。”意为，用网捕猎俘虏，有大收获，没有灾祸。此卦名“晋”，本意是进攻，甲骨文写作U，字形是两支箭射中同一个靶子。

此外，在《易经》多个卦，如大壮、解、损、益、井、革、丰、未济等的爻辞中，都有“有孚”，即占卜显示会有所俘获。自亶父迁居周原，周人一直为商朝捕猎羌人，所以周昌在研究《易经》占算方法时，很关注预测捕俘的结果。

全是捕俘技术的，是需卦。周人捕猎俘虏的经验，在需卦中有很多记载。“需”通“须”，字意是等待。这个卦主要是有关设伏和诱敌的技巧的。

有孚。光亨，贞吉。利涉大川。

初九：需于郊，利用恒。无咎。

九二：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终吉。

九三：需于泥，致寇至。

六四：需于血，出自穴。

九五：需于酒食，贞吉。

上六：入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，终吉。

先看卦辞：“有孚。光亨，贞吉。利涉大川。”意为，会有所俘获，很荣耀，举行祭祀，占算的结果吉利；有利于渡过大河。

前面三条爻辞有“需于郊”“需于沙”和“需于泥”，分别是讲在郊野、沙地和泥泞中设伏。

初九爻曰：“需于郊，利用恒。无咎。”大意是，在郊野设伏，必须有耐心，结果没有灾祸。

九二爻曰：“需于沙，小有言，终吉。”大意是，在沙地设伏，但周人为此发生了小的争论（可能是对设伏地点有不同意见），最终的结果吉利，有俘获。

九三爻曰：“需于泥，致寇至。”大意是，在泥泞中设伏，终于等到敌寇进入伏击圈。

六四爻曰：“需于血，出自穴。”可能是说，在袭击敌村落的战斗结束后，地上还有流血的伏尸，但有些周军不急于撤走，并在村内再次设伏，等藏匿者（逃入地窖中）出现时将其捉获。

九五爻曰：“需于酒食，贞吉。”可能是说，假意举行招待宴会以诱俘对方，占卜的结果吉利。

显然，上述这些战术来自很多成功的战例，应是自亶父以来周人积累的捕俘经验。

最后一条上六爻曰：“人于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敬之，终吉”如前文所述，这句爻辞的意思大致是说，周人的捕俘生涯始于三位不速之客到豳地窑洞里拜访亶父，邀请周族定居周原。

《易经》里为何会有这么多周人生活的真实记录？这便涉及周昌创作《易经》的目的：研究各种事物背后的因果联系，最终建立一套翦商的理论和操作方法。对此，我们后面会专门介绍。

《易经》从未记载过周人捕俘的数量，但前述文王大宅地窖的一片甲骨（H31：3）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信息：“八月辛卯卜曰：其梦启；往西，亡咎，获其五十人？”显然，这是文王为捕捉五十人而占卜。看来，周人每次捕俘的数量在数十人范围，不算太大。

逃脱的公羊，顽抗的羌酋

《易经》的大壮卦也是关于捕猎俘虏的，而且爻辞中多次出现了公羊（班）被捕获和逃脱的场景。

大壮：利贞。

初九：壮于趾。征，凶。有孚。

九二：贞吉。

九三：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。贞厉。羝羊触藩，羸其角。

九四：贞吉，悔亡。藩决不羸，壮于大舆之就。

六五：丧羊于易。无悔。

上六：族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。无攸利，艰则吉。

周人捕俘的对象是羌人。甲骨文“羌”的字形，羊头，男人身，所以大壮卦里的公羊应是羌人的代称。爻辞中频繁出现的“壮”字，高亨解释为“戕二也就是伤”。³

初九爻曰：“壮于趾，征，凶，有孚意思是，脚会受伤，出征的结果凶险，但有所俘获。

九三爻曰：“小人用壮，君子用罔。”意思是，对地位低的羌人（小人），可以打伤以后俘获（用壮），但对于部族的酋长（君子），最好用猎网捕获，以避免其受伤。这自然是因为，在商人那里，人牲的地位越高越珍贵，最好保证其无伤损。殷墟甲骨显示，

商王会用“羌方伯”献祭，这种羌人首领也最受商王列祖列宗的喜爱。

此外，有些还有利用价值的俘虏，可能会被周昌释放，委以某些职务。《墨子·尚贤上》有一处记载说：“文王举閔天、泰颠于置罔之中，授之政，西土服。”意思是说，閔天和泰颠都是文王在猎网中发现的人才；文王让他们管理政事，于是西土部落皆归附周邦。

这可能是周昌为争取某些特定部落的归附，对俘获的上层人物的一种利用。但有这种好运的俘虏肯定是极少数。此外，《墨子》的这处记载也颇为诡异，不知它是如何获取蛮荒时代的周族信息的，所以它的本意也可能是说，閔天和泰颠原本就是用网捕猎的猎人，后来得到了周昌的重用。

回到大壮卦的九三爻，爻辞继续说，“贞厉”，即占卜的结果不太顺利；然后，“班羊触藩，羸其角”，即公羊冲撞到篱笆上，羊角被篱笆绊住。这似乎是比喻羌人首领被猎网捕获。

九四爻曰：“贞吉，悔亡。藩决不羸，壮于大舆之輹。”意思是，占卜结果吉利，没什么后悔的；公羊又撞破了篱笆逃走，还破坏了大车的辐条。这可能是隐喻被网住的羌人首领又逃走了，还在抵抗乘车追逐的周军时打坏了车辆。可见，周人是驾着马车捕俘的，而且捕捉完整且没受伤的首领的难度要大得多。


六五爻曰：“丧羊于易。无悔。”显然，这里用的是商朝先祖王亥“丧牛于易”的典故，但用代表羌人的羊替换了牛，应当是隐喻某些差点被捕获的羊（羌人）逃脱了。占卜的结果是不需要后悔。可见，周昌在使用商人先祖的掌故时，未必忠实于原意，或者说，他更重视古为今用。

上六爻曰：“羝羊触藩，不能退，不能遂。无攸利，艰则吉。”意思是，没能逃脱猎网的羌人首领，就像羊角被缠住的公羊一样无法进退。占卜的结果是没什么收获，经历一番艰险，反倒有吉利的结局。

那么，大壮卦为何要用公羊代表羌人，还写得这么隐晦？本书认为，这可能是因为周人和羌人有古老的同宗亲缘，对周族来说，替商朝捕猎羌人在道义上是一种耻辱。所以，即便创作《易经》时，周昌已经比较商化，使用的也是商人的语言和思维，但他还是表达得非常隐晦，甚至不愿写出“羌”字。而且，在《易经》中，周昌记录捕羌用的都是“孚”字——这个字不带族群含义，应该也有不触及周人隐痛之意。

押解俘虏的经验

除了捕俘经验，《易经》的内容更多是有关如何捆绑和养活羌俘的，既要保证他们不能逃跑，也要让他们不至于因为伤痛和饥饿而死。

睽卦九四爻中有“交孚”二字。甲骨文的“交”字，写作，像人的双腿呈交叉之形，所以“交孚”可能是指在押送途中宿营时，要把俘虏的双腿捆绑起来以防止其逃走。从龙山时代到殷墟的各种人祭坑，常见有绑起双腿活埋的尸骨，可能也属于“交


小畜卦六四爻曰：“有孚，血去惕出，无咎。”⁴意思是，有俘虏，为他们止血，消除他们的恐惧，就不会有麻烦。

大有卦六五爻曰：“厥孚交如，威如。吉。”意思是，有俘虏被绑了起来，但还是气势汹汹。这是吉利的卦象。另，家人卦的上九爻“有孚威如，终吉”描绘的也是类似场景。

“吉”和“终吉”显然不是说俘虏的命运，而是说占算者周昌：商朝喜欢接收精壮的人牲，倘若捉到的俘虏英武健壮，就更容易押解到殷都而不至于死在路上，周人自然能得到更多嘉奖。

垢卦初六爻有“孚跳躅”，说的是俘虏走路蹒跚瘸腿。这可能是在被抓捕中受的伤，也可能是不听命令被殴打所致。该卦九三爻为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。厉，无大咎”，意思是，（俘虏）臀部被打得溃烂，致使走路困难；占算的结果是有磨难，但没有大的灾害。另，夬卦九四爻也有“臀无肤，其行次且”，看来这种情况很常见。

前述需卦的内容是关于设伏和偷袭，但周人也有和敌人正面交锋的时候。中孚卦六三爻曰：“得敌，或鼓或罢，或泣或歌。”这应该是指双方有准备的会战，会敲鼓以助军威。“或”表示两种选择，或者击鼓进军，或者仓皇撤退（罢）；结果也有两种，或是战败，幸存者哭泣，或是胜利，战胜者高唱凯歌。

中孚卦九五爻说的就是战胜的场景：“有孚挛如。无咎。”“挛如”是俘虏捆成串的样子。甲骨文的“挛”字，写作像一手提两串或三串丝绳之形，可引申为牵着成串的俘虏。小畜卦九五爻也曰：“有孚挛如，富以其邻。”这个“富以其邻”可能指捕获了大量俘虏，自己和邻居们都会富裕起来。看来，周人是部落武装出征，捕俘、进贡之后获得的赏赐，全族人都能分享。

比卦初六爻曰：“有孚，比之，无咎。”意思是，有俘虏之后，把他们排队（绑起来）就不会有麻烦。而且，“有孚，盈缶。终来有它，吉”，是说还要用陶盆盛满饭给他们吃，即使发生什么变故，最终也会吉利。

泰卦则记载了另一种情况。九三爻曰：“勿恤其孚，于食有福。”似乎是说过于吝惜食物，不肯给俘虏吃。接着，六四爻则曰：“翩翩，不富以其邻，不戒以孚。”意思是说，倘若因没有看管好俘虏致其伺机逃跑，那大家就都没有了发财的机会。

随卦的内容更复杂，主要是讲追捕逃跑的俘虏。

随：元亨，利贞，无咎。

初九：官有渝，贞吉。出门交有功。

六二：系小子，失丈夫。

六三：系丈夫，失小子。随，有求，得利。居贞。

九四：随有获，贞凶。有孚在道，以明，何咎。

九五：孚于嘉，吉。

上六：拘系之，乃从维之。王用亨于西山。

六二爻为“系小子，失丈夫”，即捕获并捆绑了男童，但成年男人逃跑了。六三爻则相反，“系丈夫，失小子”。周人捕俘经常是偷袭羌人的部落和家宅，所以捕猎对象会有成年男女和老弱妇孺各种人。

甲骨文的“系”字，写作𠂔，像一个人被绑住脖子，或者双手和脖子绑在一起。武丁的甲骨卜辞中，有“羌系”“十羌系”（《合集》1097）的记载，指的是商王捕获并捆绑羌俘。到商代晚期已很少见商王亲自捕俘的卜辞了，因为此时捕俘的工作主要是由周人这种附庸部族来完成的，已不需要商朝亲自动手。



《合集》1097：……羌。王占〔曰〕……生（又）二日癸酉……十羌系……十丙生（又）……

九四爻和九五爻的“有孚在道，以明”“孚于嘉”，像是在推算俘虏逃跑的去向，然后加以追捕。本卦名“随、本身就是追捕之意。

上六爻说的则是捉住了逃俘，更结实地捆绑起来（从维之），并押到殷都：“王用亨于西山。”按高亨的解释，“亨”通“享”，即向神灵献祭，贡献饮食。殷都西边紧邻太行山脉，可能商王会定期进山祭祀，而周昌这次押送来的俘虏正好用上了。⁵

关于周昌如何获得去往殷都的机会，以及到殷都后的遭遇，《易经》里还有一些记载，我们后面会详细介绍。

当然，频频外出捕猎俘虏，并不意味着周人已经是西土最强大的部族，可以高枕无忧了。因为结怨太多，周族人也会遭到其他部落的报复，导致他们时刻生活在惊惧的警戒之中。这在《易经》中也有反映。

比如，蒙卦上九爻曰：“不利为寇，利御寇。”意思是说，不利于入侵别人，但有利于防御别人的人侵。再如，鼎卦九二爻曰：

“我仇有疾， 不我能即， 吉。”意思是说，我的仇人生病了，无法来攻击我， 占算 的结果吉利。这都是周昌在测算周族会不会遭到敌对部族的进攻。

此外，《易经》中有三个卦都包含“匪寇，婚媾”，意为不是入侵者， 而是来寻求缔结婚姻的（外族）人。贲卦六四爻和屯卦六二爻的场景都是聚落外出现了陌生的人群，还有人赶着马车，被怀疑是入侵者到来。

贲如、皤如，白马翰如，匪寇，婚媾。（贲卦六四爻） 先张之弧，后说之弧。匪寇，婚媾。（睽卦上九爻） 屯如、退如，乘马班如，匪寇，婚媾。（屯卦六二爻）

可见，周族人生活得相当警觉。

当时，西土还没进入国家时代，部族间的劫掠战争频频发生。另

外，这也说明，周人及邻近各族都奉行族外婚制，但即便是部落间的通婚也难以避免战争发生。

面见纣王的机会

在文王生命的前五十年里，日子一直过得还算正常。那时，他是一位臣服于商朝的部族长老，除了时而沉迷于隐秘的占卜实验，这样的生活还看不到有什么突变的可能。

本来，自季历死后，周族首领就再没有去殷都的记录，这一时期的商王卜辞里也从未出现过周族。然而，某些巧合还是让周昌有了见商王的机会。史书里没有记载此事，但出土的甲骨文提供了线索。



周原甲骨H11:3放大后的照片

在文王大宅窖穴里挖出的甲骨上，刻写着三行细如蚊足的微雕小字，从左到右依次是：“衣王田；至于帛；王获田？”和在殷墟发现的甲骨一样，“衣”通“殷”，“田”是田猎、狩猎。卜辞解释为：“殷（商）王来打猎了；到了帛地；王打猎会顺利吗？”

殷王就是商纣王。至于帛是何地，有研究者认为在今陕西省大荔县羌白镇，也就是渭河与黄河的交汇处稍北。这是当初武乙王（纣王曾祖父）“猎于河渭”、被雷击而死之处。纣王这次西巡可能是要祭祀武乙王。

此次关中之行，在殷墟出

土的甲骨卜辞里没有记载，但



周原甲骨H31:2摹写本：唯衣鸡子来降，其执？暨厥史（事）？
在帝尔卜日：南宫郃其作？

大概是纣王在位第十几年的事情。看来，周昌极度关注纣王的驾临，不然不会偷偷占卜。毕竟，商王已经有两代人、几十年没来过西土了，而这可能会给周族带来灾祸，或者机会。

文王大宅的另一片微雕甲骨（H31:2）卜辞，则涉及另一位商朝重要人物“衣鸡子”，也就是殷箕子。

周昌先占卜：“殷商的箕子要驾临（周原），会被他逮捕吗？还是可以侍奉他？”接着，周昌又在名“游尔”的地方占卜：“让南宫郃负责吧？”

这条关于箕子的卜辞，学者一般解释为：周武王灭商后，箕子来到关中投降周朝时，周武王占卜应如何接待。但这种解释未必成立。

据《史记》，箕子是商纣王的近亲（后世注家说是庶兄或者叔父）。在周武王伐商之前，箕子曾经触怒纣王，被关进了监狱，靠

装疯才活下来（“乃被发佯狂而为奴”）。7而据《尚书·洪范》，周武王灭商、进占殷都之后，”命召公释箕子之囚”，还当面向箕子请教治国之道。从《史记》和《尚书》的这些内容来看，刚占领殷都时，武王和箕子已经有交往，按理说不需要箕子舍近求远，再到关中投降一次。

所以，H31:2的“鸡子来”卜辞应当是周昌时期的，和纣王到帛地行猎是同一事件：纣王驻理在关中东部，派箕子再向西视察周族等关中番邦。在殷墟卜辞中，“降”一般指神灵降福或亲自降临人间。而箕子是商朝重臣，对周邦来说自然非常尊贵，所以“来降”并非来投降，而是驾临之意。同时周昌也非常紧张，担心箕子此行会逮捕自己（其执？）——他可能是联想到了父亲季历在殷都的下场。

至于南宫郤，史书中查无此人，但武王灭商时，有位将领叫南宫括：”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，发巨桥之粟。”（《史记·周本纪》）所以，“郤”和“括”也许是同一字的不同写法，也许两人是同一家族之人。

从这些零散的信息推测，周昌应该是在接待箕子时赢得了这位商朝重臣的好感，这才获准到帛地拜见纣王。对周昌来说，这是个求之不得的机会：往常，他能见到的最高级别的商人是老牛坡的崇侯，现在则先是接待商朝大臣，接着还要去朝拜商王，自然有受提拔的机会。

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周昌首次朝见纣王的记载，但肯定比较顺利，因为周昌又获得了去殷都的机会。这次他可能还押送着一批羌人俘虏。对此，《易经》里有多处记载。

关于周昌去殷都献俘途中的经历，前面已做了介绍。这里再补充一点关于箕子的分析。在《史记》等文献里，箕子是商朝忠臣，因忠言逆耳而招来纣王的震怒和牢狱之灾。但实际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。作为王室宗亲，箕子地位极高，倘若王朝形势有变，他是离王位很近的人——商朝一直有王位兄弟相传的做法（虽然最近几代都是父子相传，但传统并非没有再现的可能），所以他和纣王的关系比较微妙。考虑到纣王在统治后期经常压制王室近亲，并因此招致越来越多的反对，不排除箕子巡视关中，对周族等番邦潜在的军事实力有了一些了解后，暗中萌生拉拢番邦想法的可能，以备万一王朝有变时，可以纠集起忠于自己的武装。

但箕子和周昌应该都不会想到，他们的这次偶然相识会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。

目睹殷都献祭仪式

周昌押送俘虏到殷都后，自然会目睹商人的各种杀俘献祭仪式。

先是在商王宫廷中举行献俘仪式。夬卦曰：“扬于王庭，孚号有厉”“扬”，是臣民颂扬王的伟大，“扬于王庭”是商周时臣下参见王的习语。“孚号有厉”意思是，有俘虏大声惨叫，说明可能同时有杀祭举行。

《礼记·郊特性》记载：“殷人尚声，臭味未成，涤荡其声。乐三阕，然后出迎牲，声音之号，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。”商人祭祀最 重视声音，所谓“殷人尚声”。献祭的动物大声地嚎叫，是在向天界 神祇报告祭品强壮、合格，所谓“声音之号，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”。《礼记》是东周时人编写的，当时的人已经不太知道